

■新作聚焦

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 城市历史记忆的个体言说

□蔚蓝

武昌以前是有城的,在读方方的《武昌城》之前,武汉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概念,尽管留下了“大东门”、“小东门”、“汉阳门”这样一些地名,可那里已是立交纵横、车水马龙,城墙与城门早已没了踪影。发生在1926年初秋在北伐战争,攻城的北伐军和守城的北洋军在武昌城内对外对峙,持续了40天的残酷的围城守城战役,使武昌曾经有过的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毁于一旦,灰飞烟灭。而今天,正像方方所说“时光将这一切都已掩埋。生活在这时光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方方的小说向今天的人们提示着这一段被湮灭了的城市的历史记忆,这记忆如此沉重感伤,又让人思绪万千。

《武昌城》写作的缘起,是方方为写书而长时间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泡资料的附带收获。那些史料中所沉积的历史真相,更对当下民众对历史的遗忘都对方方是个触动,促使她以文学的想象和笔触重现了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讲述了几乎被武汉人遗忘的一段城市史。正因此,作为小说的《武昌城》的阅读意义是超出文学之外的——那些存放在图书馆或是历史档案库里的有关武昌战役的历史资料,包括那些具体的原始事件文本和抽象的阵亡数字,因为年代久远而又不易接触,并不会对普通人有直接的影响,不知不晓也就不体现任何意义。但是方方的小说所讲述的是可感的,有人物、故事情节的细节的城市历史,而有细节的历史对普通受众就产生了意义,他们会和方方最初一样吃惊,“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不仅使更多的人从故事中感性地重建了武昌曾经有城的概念,而且会从作品中,从后面所附录的部分阵亡将士名单中去深切地体悟和感慨,革命的进程是怎样由无数的生命的消逝来推进完成的,这其中既有成千上万抛洒热血的革命者,也

■看小说

钟求是《皈依》 无灵魂的肉身与有灵魂的尴尬

《皈依》(《收获》2011年第2期)写的是都市情感故事,“情感”而有“故事”在当代都市人来说,莫不是与“第三者”、“婚外恋”这些字眼有关的:结婚十多年的“我”和妻子松芝本来就“日子里塞着太多的平淡”,不料妻子竟然皈依了佛门,皈依的她不仅定期吃素,更对正常的夫妻生活施以“定期”,这造成了“我”的压抑和恼怒,顺水推舟地,我认识了宋谦——说顺水推舟是因为“我”的生活本就被充满了寂寞,它与妻子皈依不皈依关系不大,而与麻将、K歌、饭局所构成的非“我”独有的都市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而妻子的“皈依”无非放大了“我”的寂寞,并给了“我”释放的“借口”。但“我”和宋谦却并没有成功,在最关键的时刻,寺庙的钟声传来,破坏了一场本该美妙的偷情。“钟声雄壮悠长,气势充沛,一下一下,在山上形成回音”,这“雄壮悠长”的钟声让“我”“闹起来”的身体突归平静,“我的身子于是顿悟似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边是寺庙、钟声、皈依,一边是赤裸裸的男女肉身,多么富有视觉冲击的图景!小说的语言诙谐机智,但却透着现代都市人独有的颓然之气——紫陌红尘中的片刻淡出,暮鼓晨钟前的仓然驻足,这是刹那间的灵魂出窍,还是生命之门的开启?作者在此借由“我”所传达的,与其说是一种确信,毋宁说是一种困惑吧。

何玉茹《我和兰芳和兰芽》 当疼痛弥漫成一个时代

对于正常活着的人来说,活着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去活。《我和兰芳和兰芽》(《北京文学》2011年第5期)写了三个女人:年届退休的兰芳、兰芽与“我”。她们是同事兼好友、志同道合的好友,她们的“志”和“道”,是她们主动与世俗保持距离,她们逛书店、讨论哲学社科问题、对功利的同事保持公然的对立与蔑视;在这样的状态中她们平安度过了大半生;与她们相反,“我”则是个浪漫的人,看透一切也漠然着一切,作为好友在兰芳和兰芽喜怒时总“神清气定”,永远与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不疏远,却也决不亲近”——三个女人两种态度。兰芳和兰芽貌似另类,但兰芽受到了“哲学老师”丈夫的影响,她又影响了兰芳,加上她们本身便曾走过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所以她们的态度不难于理解。但整个小说却不是写理想主义的坚持,而是它的改变,立志“一生不为柴米油盐所缠”的兰芽,突然开始“关注自个儿”的身体,不管身体以外的事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背后是:“烦躁”和“害怕”——“烦躁”曾经的自己,又“害怕”因为这“烦躁”而变得如“我”般“没有激情”。小说写的就是这样一场精神危机,危机发生在一个普通妇女身上,并造成了她内心的坍塌。小说没有突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不鲜活,但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深度”,它超越表层的人和事,直指当下时代的一种“隐痛”:一个从理想主义年代走过的普通女人的精神危机在当下算得了什么呢——“因为这世界太大的缘故,我和兰芳和兰芽,在这世界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李勇)

有许许多多无辜的被卷进了战争的老百姓。也从此,他们再看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便有了不同于从前的眼光,于我,就是如此。

方方写《武昌城》,在将历史资料做艺术化的阐释中,并不仅仅是要表现革命军北伐攻城的历史,并不是想借此去穿透和证实历史的真相,而是在这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框架下,着重去观照和表现城与人的存亡。这是在主体想象扩张下的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也是一种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因此,对这样一部既不是凭空虚构,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复原历史的小说,就不需要以史学家的眼光从历史的维度去进行考查,而应更多地去感知方方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去观照其历史叙述方式的特点,还有人物塑造和编织小说情节的技巧,以及语言表达的诗性特征等等。从这些方面去审视,《武昌城》是体现出作家的创意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的,小说所提供的对历史事件的想象和思情寓意,让读者对这场战争对武昌城和城里百姓的戕害,尤其对那些已平躺在纸面上的阵亡者有了一种切身的感知和深刻的痛感,也由此对武昌城的这段历史刻骨铭心。

首先要肯定的还是方方的《武昌城》最大限度地倚重了文学的想象力,充分体现了小说作为虚构性叙事文体的最本质的精神。她在充分的想象中,借以圆熟纯青的文学之笔,完成了对小说艺术空间的搭置。发生在1926年初秋武昌战役,还有小说中出现的,诸如陈定一、曹渊、叶挺、郭沫若、纪德甫、邓演达、刘玉春、刘佐龙、吴佩孚等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都曾是历史的实体性的存在。但这些只是引发故事的因素,被方方当做了建构自我主体想象的叙事空间的基本元素。借助于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框架,方方寻找到了激发自己讲述故事的由头,使自己的想象有了一个生根之处,凭此去实现自我的历史言说,也借此去参悟战争中所呈现出的

■第一感受

在地为马、在天如鹰的歌者

□徐坤

在叶舟诗集《大敦煌》的第137页,夹着一张十年前我顺手搁放的暂充书签的便条,就是宾馆床头柜上搁置的那种常见便笺。那上边的抬头是“敦煌市清泉宾馆”。便笺底下,压着的是叶舟的诗《青海湖》——“心灵的继承者!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便笺上边,有我涂抹的零星句子:“刀子中的刀子/你是/男人中的男人/王中之王”。字用铅笔写就,是宾馆床头柜上跟便笺配套的短笺条。

十年后,为了写这篇叶舟评记,我重新翻阅《大敦煌》,于是乎便与这张古老的便笺不期而遇。纸笺已经发黄,而铅笔字迹仍然清晰。一张小小的便笺,见证了岁月,也见证了当年一个文学女青年为一个诗人迷狂的过程。

“心灵的继承者!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青海湖》开篇的诗句,轰然作响!它构成了我跟诗人叶舟的第一次相遇。1998年秋季,我跟随西南军区的队伍进了一次西藏。有过进藏经历的人都知道,人在高原时,顶礼膜拜,奋力向上,同时又头疼缺氧,生不如死;一旦回到平地,事后的回忆咀嚼里,全是圣洁的唱诵与光荣,遭受的痛苦全然不计。如刘醒龙、宁肯、范稳这些汉人,一群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行者,在地球高地的无人处萍聚,撞击。站得越高,脑袋越疼。世界在太阳穴里嗡嗡作响。

我的西藏情结也持续许久。某天,在京郊小书店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两本新出的《西藏旅游》,立即如获至宝,站在架前翻阅。蓦地,《青海湖》那些带着海拔、带着高原寒气与凛冽的诗句,哆哆嗦嗦击中心扉:“心灵的继承者!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野蜂凄凄/蝴蝶呼喊/一阵阵高入天堂的狂雪引人入胜。”水汽汽漫诗句,

■短评

综览当下文学评论界,伴随着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研究的兴起,囿于小说自身的“怎么写”话题确有渐次淡出作家视野之势。反观小说家虽时有涉及“怎么写”的创作自述、新作访谈,却终究流于具体瑣碎、枝蔓芜杂。借此背景阅读王安忆新近出版的《故事与讲故事》一书,四篇看似跳跃又连贯的标题,其下却分明有着内在的承续:作者着力倡明小说观念,解析经典叙事,集中阐释、佐证、建构了小说家词典中的“怎么写”,其分量与意义自不待言。

小说家词典中的“怎么写”,30年来隐然有其领悟、演进的脉络。书中自承:“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时间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论的是小说情节,却未尝不可放大为王安忆关于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性构想。时下小说题材与视角丰富芜杂,她却依然流连于如此这般的划地自限:《长恨歌》《富萍》《天香》,众多小说皆围绕上海场域、女性视角,复查回旋。因此诘其视野不够廓大的评论却未免忽略了上海、女性仅是其呈现在外的时空向度,主

复杂的人性。在对历史记忆的表现中,方方着重展示的是生命的多样性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攻城与守城,作为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只是对凸现在前台的个体生命的映衬,方方观照的视点是在一个个体所感兴趣的、有着多重复杂的人格类型上,诸如不同阵营的罗以南和马维甫,他们内心的纠结和抗争命运的无奈,给方方提供了穿透人性的机会,使她就此表达属于个人的独到发现。

《武昌城》分为上部“攻城篇”,和下部“守城篇”。上部人物情节线比较多,写行动多,体现了“攻城”的“动”的特点。青年学生罗以南因对他有过救命之恩的生死朋友、革命领袖陈定一被北洋军阀砍了头而万念俱灰,一心想出家做和尚,半路遇见了追随北伐军的同学梁克斯,被他鼓动和硬拽着参加了北伐军,成为政治部的宣传员。而梁克斯则执意要加入敢死队,并且顶替他人参加了攻城,双腿炸断困在城门洞里。与这一条线交织的是梁克斯的表哥,独立团连长莫正奇,作为叶挺最看重的猛将,他敢打敢冲,不畏牺牲,代表着北伐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攻城一次伤亡惨重,便不得不改为围城,其后的战斗都是为了抢尸救人。在上部方方塑造了一组北伐英雄的群像,从军官、士兵到女护士,他们舍生忘死的精神都令人难忘。下部主要以罗以南的同学陈明武和北洋军参谋马维甫为主来展开叙事,描写围城40天里,武昌城内百姓所遭受的饥饿、杀戮、奸淫和抢掠等人间惨状,以及无数生命的消逝。由陈明武这些支持革命的学生策反守城军官打开了城门,结束了武昌战役。方方借小说表达了自己的战争观,不论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和革命性如何,最遭殃的是城中的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女性,不论是富家小姐洪佩珠,还是学生阿兰,或是下人吴妈,她们几乎是无可逃脱地遭到战争的蹂躏和戕害。

在《武昌城》中,方方摒弃了用固有的观念

看待历史的方法,她把攻城的北伐军和守城的北洋军基本置于对等的叙事中,不是简单地把对峙的双方处理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而是站在每个人物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感同身受地去写他们,通过对立交锋的冲突来完成对双方主人公的刻画,重点表现的是双方同样作为优秀的军人所承受的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苦难,以及内心所曾有过的各种挣扎。人格和人性是方方创作中一贯看重并重点表现的内容,在罗以南身上就体现着一种人格精神的支撑。看似软弱无用又羸血的他居然一次次地不惧怕枪炮和死亡去救同学梁克斯,他觉得既然知道人还活着,就做不到不闻不问,更做不到不去相救。而他后来没去出家并且替代梁克斯去战斗,都是在践行着梁克斯的遗嘱。在与护士张文秀有关信仰和叛变的对话中,对革命并无坚定信仰的他强调的是自己的人格。另一个人物马维甫,虽然是在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他身上,却体现着人性的幽光。我认为下部比上都写得好,就是因为下部对马维甫的内心冲突的剖析层层深入,非常细致,将他的人性悲剧写得淋漓尽致。作为朋友,他因没有去救与他三年共进退的袁宗春而整夜噩梦;作为军人,他因背叛了多年提携他、信任他的上司,觉得羞愧难当;作为守卫城门的军官,想要恪守职责,却又不忍看着濒死的城中百姓而不去救。他拯救了自己的良心,打开了城门,又摧毁了自己全部的人格,这是不可承受的内心之痛,也是无法承受的历史之重,因而,最终他只能将这些所有无法承受的沉重随他一起从城墙上下跌。对他的悲剧,方方参悟得极深极透,这是她热爱的人物,如她所说,“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

《武昌城》看似是个宏大的小说主题,却以一种貌似日常化的叙事来完成,以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完成着对历史事件的重新理解和尝试;从个人命运和生存体验的角度,保全了在急剧动荡的历史事件中人类兴衰变迁的经验,这就是《武昌城》的叙事特点。对罗以南、梁克斯、陈明武这些学生类型的刻画,写足了早期革命者所具有的浪漫、充满激情的特征,以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最初选择革命时曾有过的犹疑。而在莫正奇、马维甫这类军人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投身行伍所抱有的理想。不论是哪一类人,作者都直观而生动地呈现出他们各不相同的精神成长的旅程。缘此,不仅可以满足读者渴望真实地了解历史的欲望,而且也可以帮助他们去认识人类进步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他这样提示,我们仍记得曾经的相见。顾武兄的气场,那叫多么大啊!雄震万里,拢盖八方。有他在场的场合,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儿哟!都统统成了蹭饭的、蹭会的、蹭镜头的摆设。别人互相记不住,也是应该的。

好在现实生活当中,叶舟是个随和柔软的人,对朋友很尽心。不一会儿,酒席宴上一喝起来,就把前嫌忘了。一场指认的笑话,还是让北京作家群笑罢揶揄了我一路。

我们要继续往西部腹地深处走。临别,叶舟赠我诗集一册:《大敦煌》。那正是叶舟的黄金时代,是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大胆狂徒、醉鬼和侠客时代——十几年后,李敬泽在叶舟小说集的前言里这样说。

对于诗人叶舟来说,假如诗是一种攀登、永无止境的上行,那么,小说的下坡路,就是直接通往死亡的。珠峰登顶的人往往死在下山的途中。叶舟用写诗的句子来策划小说,语言仍然凛冽、倔傲,充满内在的紧张和爆发力。他用起承转合的情节,用故事的戏剧性逃脱了注定下山乏力的命运。《羊群入城》《目击》《两个人的车站》……仍是一片诗歌的阵仗,处处燃烧着《大敦煌》余烬的火光。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以自己顽强的逻辑,不肯与生活和解。

到了2006年,他摸到了下山营地,节奏舒缓,平心静气,宣布登顶后的撤离已然成功。

2010年叶舟的中篇小说《姓黄的河流》写出了类同《大敦煌》的雄浑气象。在杂志上读过之后,我立即给他发去短信,赞这是一部中国版的《朗读者》。当然,也许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被比附。我却认为,《姓黄的河流》是他十年下山、十年磨励、励精图治、肝胆相照之作。他已经技巧圆熟,指挥调动有力,想象力丰沛,对母语遣词造句有讲究,自如地将跨文化情境、悬疑色彩、诡异情节……这些好小说里该有的元素都运用起来,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文化论”的王国。把小说写到这会子,才是谁也拦他不住了。

在地为马、在天如鹰的歌者!这一地鸡毛、醉生梦死的小说时刻,可还记得,那野花沸腾的水面,曾经多么的宁静?

书中特辟“经典”编。有别于新解理论家但凡举例必称西方名著之局限,书中虽也援引《约翰·克利斯朵夫》《百年孤独》等经典佐证自己的观点,但又分外关注《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之“怎么写”。如针砭《水浒》一类的章回小说,许多故事只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并列,而缺乏内在的因果联系,故未能造成一个更强大的递进形势;又如专举五代梁吴均的《阳羡书生》为例,激赏其“中国盒子”式的一个套一个”的叙事结构,印证中国古典小说之叙事不乏与域外先锋小说异曲同工的精妙。以中外经典创作为借鉴,王安忆洞穿了经典的“神灵之火”有时很可能是一种没有火种、难以传递的燃烧,与其守株等待神秘主义式的了悟,不如寄望于汲取经典中那些能“以物质化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经验并引为借镜。后者更为切实可行。

回顾30年小说创作历程,自序中,王安忆再次昭告其屡屡企及的小说创作“四不”原则:“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然则在流行小说观念的抵牾中时或横生吊诡:不要语言风格化的王安忆却在调和黎明与精确、平衡世俗与优雅,兼容平实与新奇的周折中,形成了自家不无独特语言风格。也许,“四不”原则只是“四要”的反拨纠偏;而优秀小说家则恰能悟得如何在“四不”与“四要”的张力间把控“怎么写”的动态平衡。

■创作谈

武昌以前是有城的。这个概念我竟长久不知。

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青少年时代住在江南汉口,30岁后住到了江汉武昌。我在山水逶迤的武昌街上来来去去,逐渐对它的地名了如指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了洪山看蛇山,也骑着自行车穿过古楼洞,路经胭脂路,还到花园山参观过老教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

直到有一天,我的同学武全约我一起去罢华林看老街老建筑。复夏全在《长江日报》当副刊部主任,跟我在武大中文系同一个班甚至同一个小组。毕业后因到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文学相关,所以我们日常来往颇多。他们要做一个关于城市老建筑保护的专题,请我也说说话。这样的邀约我自然不能不去。便是那一次,我在湖北的邀客石琰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去的历史专家冯天瑜说,这真是老武昌城的城墙脚。我有些惊讶,甚至有点震动。抚摸着那些古朴而苍老的墙砖,心里竟有万千感受奔腾而起。原来武昌有城啊!我当时这么想。

然后就开始留意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写《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三本书,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资料以及在武汉的街巷中穿梭考察,甚至开着车,把整个张公堤从头到尾跑了一遍。长时间的泡资料以及实地观看,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我知道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时光将这一切都已掩埋。生活在这时光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这其中包括1926年初秋武昌围城。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东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知道的是,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但你们却只是默然。

我动念写《武昌城》是2006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资料后,我开始动笔。这一年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10月,几乎在当年围城结束的日子,我写完了它的上部,即围城部分,有近8万字。小说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因为篇幅太大,不便转载,读到它的人不多。这是很让我遗憾的一件事。

小说发表没多久,我在东北大学当教授的二哥来武汉开会,会议结束后在我家小住了两天。二哥是文学爱好者,早年当知青时在乡下写过小说和相声,说来当年也是湖北的业余作家。我们经常笑说,如果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选择的是中文系的话,说不定就是老三届作家中的一员了。但是二哥的愿望却是当科学家,他选择了理工科,成了他所学专业领域的专家。虽然远离文坛,二哥却仍然热爱阅读,他把高阳所有的历史小说都读了一遍,我家的二河月小说也都挪到了二哥的书架上。而我二嫂则是王安忆最忠实的读者。在我家小住的两天里,二哥读到了《武昌城》。他说,你写得很好呀,我非常喜欢。可是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长篇呢?

其实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我就是中篇的构想。我恐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但二哥的话对我却是富有诱惑力的提示。我想,是啊,其实是可以写成长篇的。我可以按我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写,按我所理解的历史氛围和我所推测的战争场景来写。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于是回过头来,我再次翻阅资料。那些曾经被我放弃的关于武昌战役的武林总总,重新浮出水面。同时,我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更多有意思的细节以及搜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搜索中,我看到了一份有关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名单。这便是“附录”中的第六部分。这份名单令我发呆。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他们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

于是,2010年,我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我准备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展示这场战事。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们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了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问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

为了让人们能更透彻地了解武昌战役,我作了一个附录,以补充小说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毕竟,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了。

春天,我完成中篇《刀锋上的蚂蚁》之后,便开始全力写这部作品。而这期间,不断地插进一些事来,打断我的写作,所以时断时续,一直写到2011年春节前夕才完稿。感谢编辑杨柳的耐心等待。我的第一部长篇《乌泥湖年谱》亦是杨柳的责难,那部小说她等了十几年。她的认真和专业,我深有体会。我们自1983年在兰州认识后,弹指间,已经过去快30年,真的是老朋友了。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找我约写长篇,一直约到现在。我们两人所做的事似乎一成不变,她依然当她的编辑,我依然写我的小说。当年我们青春勃发,现在却已然儿近老年。有时候我会觉得,只有在和平岁月,才有可能一生都在同一个地方做同样一件事,从不改变。这样想过,真的会由衷感谢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而付出生命的人们。

武昌曾经有城

□方方